

# 银章密奏与洪熙中枢政治

赵现海

**内容提要** 明代皇帝赐予阁部大臣银章，以其封识揭帖、密奏政事的现象最早见于洪熙朝。仁宗之所以有此举措，是为专意委任监国旧臣蹇义、杨士奇而设之单独渠道，但由于杨士奇之力请，所有内阁成员皆获银章密奏之权。仁宗出于平衡的考虑，也赐予户部尚书夏原吉银章。但银章密奏对洪熙中枢政治并未产生仁宗所预期的作用，这与密奏在传统观念中的负面印象有关。相应，对密奏在明代中枢决策中之作用，不应作过高的估计。但是，银章密奏仍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仁宗感怀永乐中枢故事，以人事关系为准则重新构建中枢政治格局的尝试。

**关键词** 银章密奏 洪熙 中枢政治

臣下秘密进奏皇帝，也即密奏，作为皇帝与部分大臣直接沟通的渠道，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十分平常的现象，只是不同时期形式与作用有所区别。清代密摺制度在以往研究中获得了较多关注，近年来其他朝代之密奏现象也开始讨论。马怡《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研究了两汉以皂囊包装的密奏文书<sup>〔1〕</sup>；王剑《明代密疏研究》系统探讨了明代密奏制度的起源、形式与影响，但对洪熙朝银章密奏，仅简略交待仁宗（朱高炽，1424—1425在位）赐予银章之过程<sup>〔2〕</sup>，并未指出仁宗为何赐予大臣银章，以及态度差别背后的政治背景。笔者认为，明代阁部重臣凭借皇帝特赐银章为凭密奏国事之现象，始于洪熙年间，源于仁宗以人事关系为准则，重新构建中枢政治格局的尝试。该时期仁宗颁给中枢集团五重臣银章，命其封识揭帖以进，开创了明代阁部大臣密奏的先例。本文对洪熙年间密奏现象形成之背景、过程，及其与中枢政治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期深化对明代密奏现象的研究。

## 一 仁宗赐重臣银章及密奏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去世，仁宗即位。次月，仁宗在思善门

〔1〕 马怡：《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文史》2004年第4辑。

〔2〕 王剑：《明代密疏研究》页74-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单独召见吏部尚书蹇义(1364—1435)、阁臣杨士奇(1365—1444)，赐予银章，印文为“绳愆纠缪”。据杨士奇记载，仁宗赐予二人银章的目的在于令二人密封奏事。“卿二人自吾监国时，相辅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过举，如未得即见，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识进来。’……且各赐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盖求益于下之切也。”<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仁宗只打算赋予此二人密奏之权。但杨士奇鉴于同是阁臣的杨荣(1371—1399)、金幼孜(1367—1431)未获银章，心有不安，仁宗九月才再赐杨、金二人。“臣(杨士奇)冒昧进曰：‘臣与杨荣、金幼孜实同职任，今赐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赐荣、幼孜同一章。”<sup>2</sup>仁宗赐予二人银章亦为“绳愆纠缪”，所谕内容与谕前二人者大意相同。

且谕曰：“卿国家旧臣，祇事先帝二十余年，又辅朕于东宫，练达老成。朕今嗣位，须卿等协心匡辅；或政务阙失，朕弗听言，则用此印密疏以闻。至于再三，慎毋惮烦。朕将采纳。君臣之间，两尽其道，庶几不负祖宗托付之重。”<sup>3</sup>

十一月，仁宗又赐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1430)银章，印文亦为“绳愆纠缪”。<sup>4</sup>据杨士奇所作夏原吉墓志铭，仁宗所谕原吉者，与前四人大意相同。“且谕公曰：‘朕有过举，卿但具奏来，以此识之，朕不难于从善。’”<sup>5</sup>

以上五人，恰是洪熙中枢集团的组成人员<sup>6</sup>，仁宗赐予五人相同银章，目的便是令中枢集团重臣与自己在正常公文奏疏与君臣接见之外，开创另一单独交流、沟通之渠道。此前无论朱元璋(1368—1398在位)，还是朱棣，皆曾命小臣监视储君，密封奏事，但命中枢集团重臣，即阁臣与部分亲信六部大臣以银章为识，围绕国事进行密奏，却始于洪熙。

当月，仁宗再次表达出令五人积极建言的愿望，虽并非针对密奏事之明言，但也可看作一种暗示与鼓励。

①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一六《杨文贞公文集二·赐印章记》，页123，中华书局，1962年。

② 《明经世文编》卷一六《杨文贞公文集二·赐印章记》，页123。

③ (明)杨荣：《文敏集》附录《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杨公行实》，页1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④ 《明史》卷八《仁宗本纪》，页110，中华书局，1974年。

⑤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一二《少保户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靖夏公神道碑铭》，页180，中华书局，1998年。

⑥ 仁宗虽仍信任杨溥，不过为处理其与杨士奇、杨荣的关系，专门设置弘文阁以另处之，杨溥掌阁事，授印，令该阁成员“即有建白，封识以进”，但此为官印，即如同内阁“文渊阁印”一样，非赐杨溥之私印。(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页417，中华书局，1977年。杨溥也不掌机务。“洪熙中，溥另授弘文阁印，不与机务，宣德元年始入阁。”(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二《永乐》，页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黄淮在仁宗即位后，受到其他官员，包括监国旧臣在内的排挤，仅任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通政使位九卿最末，武英殿也是明宫廷中地位最低的宫殿)，杨溥虽时常备仁宗顾问，黄淮也拿起草诰教，不过已不参预国家大政的日常谋议，并不属于洪熙中枢集团的成员。

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门，阅廷臣制诰，顾谓三学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杜口。朕与卿等当深用为戒。”因取五人者诰词，亲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sup>1</sup>

不过与仁宗之殷切希望相比，诸臣的态度却并不积极。洪熙元年(1425)四月，也就是仁宗赐予五人银章半年之后，仅杨士奇曾有密奏。

上笑曰：“吾意非为此也，朕与诸卿相与，出自诚心，去年各与‘绳愆纠缪’图书，切望匡辅。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从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药事，不曾从，后亦悔之。蹇三人皆无一言，岂朝政果皆无阙，生民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惭色。

仁宗责备蹇义、夏原吉、杨荣之后，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至少夏、杨二人也开始密奏。“公(夏原吉)由是屡有所陈，多所裨益”<sup>2</sup>。“公杨荣顿首受命而退，遇事屡有所陈，仁宗皇帝皆嘉纳之”<sup>3</sup>。

杨士奇所密奏事基本皆被仁宗采纳，反映出银章密奏作为君臣间的单独沟通渠道，十分被仁宗注重与肯定。但诸臣为何不积极利用皇帝特殊赋予的权利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仁宗勤于上朝，与大臣直接面决朝政之外，还经常在便殿召见大臣，讨论政务。既然君臣间存在良好的沟通渠道，银章密奏的必要性便降低了。二，密奏在传统政治观念中，是一种负面的事物。洪熙诸臣虽未表述过这种看法，但北宋宰相李沆(947—1004)与明弘治朝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的言论，有助于从侧面对洪熙诸臣在密奏事上所持态度有一推测。

帝(宋真宗)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sup>4</sup>

帝(明孝宗)尝谕大夏曰：“临事辄思召卿，虑越职而止。后有当行罢者，具揭帖以进。”大夏顿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阁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为后世法。”帝称善<sup>5</sup>。

1) 《明史》卷一四七《金幼孜传》，页4127。

2) 《文敏集》卷二一《故荣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靖夏公墓志铭》，页325。

3) 《文敏集》附录《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杨公行实》，页412。

4)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页9538—9539，中华书局，1977年。

5)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页4847。

此后，密奏被延续下来，其主要形式是阁臣以“文渊阁印”封识奏进，至于六部大臣再获银章密奏之权，较为罕见。嘉靖朝因君臣关系恶化的缘故，银章密奏颇为流行，但也只是一个突出的个案而已。总之，银章密奏作为明代阁部大臣密奏形式之先例，虽然皇帝对之抱有很大期望，但大臣碍于传统政治观念，在多数时期并不积极地利用这一特权，密奏对于中枢政治相应并无太大影响，中枢决策之基本形式仍是奏疏批答与朝堂议政，密奏只是朝政运作中的辅助方案。本文探讨洪熙密奏，着眼点也非强调密奏发挥多大的政治作用，而是通过考察仁宗赐予五臣银章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五人在洪熙中枢集团中之地位及政治根源。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最早获赐银章的是蹇义、杨士奇二人，仁宗后来受杨士奇之请求，才赐予杨荣、金幼孜银章。出于平衡的考虑，又再赐夏原吉。结果虽然是中枢重臣皆获同等权利，但仁宗曾向蹇义、杨士奇表露过赐予杨荣、金幼孜银章并非本意。

既退，（仁宗）复召蹇义还。谕曰：“尔与士奇，吾监国时旧辅，原吉贤良，皆吾所倚任，各与图书自吾本心。士奇忌言，待人宜均，亦望于荣、幼孜。既与之，后往往闻荣有怨诽谤。”义对曰：“荣之不足于义者，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诽谤，臣实未闻。左右之谗，惟陛下慎察，纵其或有，亦望容之，久当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语，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三人耳，事有未当，皆须直言，勿有疑讳。”盖上之求言恳切如此。<sup>①</sup>

仁宗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其与蹇义、杨士奇三人一体，故赐银章之初衷。仁宗顾念监国旧谊，笃念蹇、杨二人心迹，在朱棣去世后，自己即位前，便已明确表露。

（仁宗）又曰：“自今朝廷事仗蹇与汝，但蹇亦有迟疑，汝须尽心。汝二人吾固当重用，不轻也。”对曰：“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当尽公，以厌服天下之心，须溥恩及下，然必先扈从征行之臣，若汉文即位，首进宋昌，史书之以为贬，此当深戒。臣两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遗，惟不应先及，此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机也。”<sup>②</sup>

以上五臣皆是永乐旧臣，是洪熙中枢集团之组成人员，仁宗却要通过银章密奏的方式，特别赋予蹇义、杨士奇特殊权利，而对夏原吉态度平淡，对杨荣、金幼孜二人颇为不满，这显示出尽管同是中枢集团之人员，五臣在仁宗心目中的印象却差别很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是永乐中枢集团分化的结果。

① 《东里文集·东里别集·圣谕录》卷中，页402。

② 《东里文集·东里别集·圣谕录》卷中，页396。

## 二 永乐中枢集团的一分为三

永乐一朝，由于朱棣时常北征与巡幸北京的缘故，经常不在南京。据朱鸿先生研究，太子朱高炽六次监国的时间共计八年有余。而在太子监国南京之外，皇太孙朱瞻基(明宣宗，1425—1435在位)在朱棣首次北征时，留守北京，充当朱棣与朱高炽之间的联络人<sup>1</sup>。由于朱棣离开南京时期甚长，部分官员跟随左右，处理朝政要务，其他多数官员便与太子、太孙一同监国、留守，负责处理朝廷庶政。这样，永乐中枢集团便一分为三：一为北巡集团，包括成祖及随从北征、巡幸北京的诸王及文武官员，文官主要是翰林官杨荣、金幼孜与胡广(1369—1418)。胡广于永乐十六年(1418)去世，该集团文臣仅余杨荣、金幼孜二人。据《明史》记载，杨荣负责参谋军务，而金幼孜却较多地体现出翰林官“文学侍从”的决策，陪伴朱棣吟诗作赋，抒发塞外之情<sup>2</sup>。二为监国集团，包括太子朱高炽，以及辅助其监国的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1415)、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1367—1449)、左春坊大学士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等<sup>3</sup>。永乐十一年(1413)后，监国集团中又增加东宫洗马杨溥(1372—1446)<sup>4</sup>。黄淮、杨溥于永乐十二年系狱，金忠于永乐十三年卒后，该集团中仅剩蹇义和杨士奇二人。至于两大政治集团权力的分工，赵中男指出，永乐七年“留守事宜”规定功臣犯罪、高级官吏的任免以及挑拨将士，需经皇帝亲自处理，其他庶务由太子裁决。永乐十五年，朱棣再次北征时，在用人、司法、祭祀等方面大大缩小了太子的权限<sup>5</sup>。可见，北巡集团负责军政要务的处理，监国集团负责朝政庶务的处理。三为留守集团，即皇太孙朱瞻基与其师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在永乐八年居于北京时所形成的政治集团<sup>6</sup>。“永乐八年。时驾北征，皇太子监国于南，皇长孙监国于北。后皇长孙行冠礼，始尊称皇太孙云。”<sup>7</sup>留守集团主要负责处理北京行政事务，联系南京与行在。《明史》如此记载夏原吉在北京的活动<sup>8</sup>：

八年，帝北征，（夏原吉）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时诸司草创，每旦，原吉入

1 朱鸿：《明永乐朝皇太子首度监国之研究(永乐七年二月至八年十一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4年第12期。

2 《明史》卷一四七《金幼孜传》，页4126，卷一四八《杨荣传》，页4139—4140。

3 《东里文集》卷一〇《题跋·题黄少保省愆集后》，页147。

4 《明史》卷六《成祖纪二》，页91。

5 赵中男：《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明史研究》第6辑，1999年，黄山书社。

6 当时留守北京者尚有赵王朱高燧，负责北京军务处理，并节制宣府镇。永乐八年，“英国公张辅等至自交阯入见，命辅提督操练宣府、万全、兴和等处军马，整治城池、屯堡、烟墩，仍听赵王调遣。”(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一，永乐八年二月甲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页1322，1962年。赵王也素有夺嫡之谋，在永乐年间自成一政治势力。由于这些与本文论述主旨无关，故不详述。

7 《大明会典》卷五四《礼部十二·皇太孙监国》，页13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内府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页4151。

佐太孙参决庶务。朝退，诸曹郎御史环请事。原吉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

由于北巡集团与监国集团分离格局长期存在，留守集团尽管并未长期主持北京政务，但太孙与夏原吉却长期共事。“寻从还南京……自是屡侍太孙，往来两京，在道随事纳忠，多所裨益”<sup>41</sup>。“皇太孙甚重之，每呼先生而不名。”<sup>42</sup>故而三大政治集团在长期政务处理与朝夕相处中，各自内部加强了认同感。

由于成祖与太子关系不睦的缘故，三大集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拒斥感。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这些被后世称为阁臣的翰林官也相应产生了分化。如跟随朱棣的杨荣、金幼孜得到了升迁<sup>43</sup>。而杨士奇甚至得罪，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上引文杨士奇请仁宗首先封赏“扈从征行”之臣，最后再顾念“日在侍匠”之臣，表达了监国官员将自己与北巡官员相区别的政治意识。在三大政治集团中，监国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应该是最强的。这源于朱高炽与朱棣长期的关系紧张，黄淮、杨溥、杨士奇先后得罪，前二者更是一系十年<sup>44</sup>。此间甚为凶险与艰难，太子集团协力共济，始得获全。此种命运相连、祸福与共的政治处境使监国集团内部诸人之间产生了十分深厚的情感，而对北巡集团抱有敌意。留守集团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中立一些。一方面，太孙为太子之子，自身将来能否登基取决于乃父地位是否牢固，其归属监国集团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成祖不喜太子，却非常喜欢太孙，太孙性格类于成祖，祖孙关系十分融洽，成祖也以夏原吉、杨荣等朝廷重臣辅导太孙。“又明年征瓦剌，太孙侍行。帝命荣以间陈说经史，兼领尚宝事。”<sup>45</sup>实际上也借此培养太孙在朝廷中的势力。太孙由于曾追随北征的缘故，除了杨荣之外，与北巡集团中其他成员也有着较多的接触。故而太孙对于北巡集团之立场，便不如监国集团那样敌视。太孙即位

<sup>41</sup>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页4151—4152。

<sup>42</sup> （明）夏原吉：《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页547，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太孙与夏原吉的留守岁月与师徒情谊使二人的感情甚深。仁宗去世后、宣宗即位前的特殊时期，张太后在诸臣中选择夏原吉主持朝政。宣宗也以夏原吉作为心腹。“仁宗宾天，公受顾命。时宣宗为皇太子，监国南京，中外汹汹，有汉庶人之忧。太后以公东宫旧辅，凡军国事悉命公裁处。公密谋急迎驾还京。驾将至，群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监国，上见辅臣，首问公安在，蹇少师等莫能对，上不悦。驾至京，召公慰曰：‘近见太后谕所以留卿意，朕方知之。卿奉皇祖命辅朕有年，朕以卿非他人比，卿当以事皇祖者事朕。’”《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2—553页。太孙即位为帝后，最为信任的官员也是夏原吉。汉王朱高煦谋反，以夏原吉为“奸邪乱政”之首。“八月，汉庶人谋反，移檄诬辅臣奸邪乱政，以公为首。”当时百官之首为吏部尚书蹇义，夏原吉也非内阁成员，却以户部尚书的身份被一般舆论视为百官之首，这间接地反映出宣宗初年，夏原吉处于中枢政治的核心。而在讨伐朱高煦之事上，亦由夏原吉最终决断。并且不避嫌疑，单独请求建皇储。《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页553，页554。这些事实都反映出夏原吉在宣德初年中枢政治中的首领地位。

<sup>43</sup> 《明史》卷一四七《金幼孜传》，第4126页，卷一四八《杨荣传》，第4139页。

<sup>44</sup> 参见前揭朱鸿：《明永乐朝皇太子首度监国之研究（永乐七年二月至八年十一月）》；张兆裕：《黄淮之狱与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明清史论文集》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赵中男：《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sup>45</sup>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页4139。

后，一改仁宗对杨荣的冷漠态度，甚为倚重。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sup>①</sup>。夏原吉在永乐年间执掌户部，供应北征粮饷，为人干练而识大体，相对于蹇义，更受成祖欣赏与重用。

十五年春三月，（夏原吉）扈从车驾巡幸北京，凡行在一应机密，公多与闻……时公虽居户部，实兼九卿之任。上神武英明，群臣罕称任使，而独眷注公。凡军国要务，必与公面议可否而后行之，召见便殿，或{門為}语移时，左右莫知所议，公退则恂恂若无所与者。上以是益重公，公感上知遇之厚，思所以报国者，靡或不尽。每承上问，即竭诚以对。<sup>②</sup>

但夏原吉曾维护太子。“十二月，皇太子及皇太孙将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上问：‘东宫来何速？’原吉对曰：‘陛下慈孝之深，东宫孝思不得不切。’上喜，赐钞二百锭，命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乡。”<sup>③</sup>并且鉴于永乐五次北征造成的沉重财政压力，在治国理念上倾向内敛，亦与仁宗一致，仁宗一改永乐朝对外政策之外向而为内敛，夏原吉的建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朱棣去世前鉴于夏原吉谏其北征，曾云“夏原吉爱我。”“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与议丧礼，复问赦诏所宜。对以振饥，省赋役，罢西洋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诸道金银课。悉从之。”<sup>④</sup>“又曰：‘今民力竭于东南，戎伍疲于漕运，宜幸南京，庶几少苏内外之困。’上曰：‘朕意亦然。’”<sup>⑤</sup>

总体来看，留守集团处于北巡与监国集团之间，连接两种政治势力，是双方政治冲突的一个缓冲地带，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调和二者矛盾的角色。相对来讲，在北巡与监国集团中，留守集团的利益与立场却更接近于后者。永乐十八年迁都后，虽然三大中枢集团一度合并，但中枢政治中的这种势力分野，却并未随之消失，并奠定了洪熙朝的中枢政治格局。

### 三 洪熙朝以人事关系重组中枢体制

仁宗即位之后，三大中枢集团分立的态势失去了依托，归并为一，中枢政治面临着重新洗牌。表面来看，洪熙中枢格局延续了永乐旧貌，只是将三大中枢集团加以归并罢了。蹇义、杨士奇因有翼戴之功，理所当然地进入中枢政治。夏原吉属于留守集团，多曾维护太子，并且永、洪之际的财政困窘局面也须其打理，也应占据中枢政治一个名额。杨荣、金幼孜作为先朝旧臣，虽属北巡集团，但并未与监国

① 宣德元年，杨荣因首倡亲征朱高煦，而获褒奖。“师还，以决策功，受上赏，赐银章五，褒予甚至。”宣德三年，宣宗巡边，仿永乐故事，独令擅于边务的杨荣随侍。《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页4141。

② 《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页547—548。

③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八《东宫》，页17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页4153。

⑤ 《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页550。

集团交恶，在成祖晏驾之后，稳定了局势，为仁宗顺利即位提供了条件，故二人地位仍得以保留。至于黄淮、杨溥，因长期系狱的关系，虽为监国旧臣，但已被排斥出既成的政治格局之外。

虽然三大中枢集团中的固定成员都进入了新朝中枢政治，并未出现某一势力完全替代其他势力的局面，但五位官员在中枢政治中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这源于仁宗对自己在永乐年间遭遇的记忆，在其脑海中仍保留着三大中枢政治集团的界限，故以人事关系为准则，重新构建中枢政治格局。

朱鸿指出，朱高炽鉴于成祖打击官僚的缘故，即位之后，重用旧人，将杨士奇提升至蹇义、夏原吉之后，内阁制度从而得以发展<sup>1</sup>。但杨士奇地位实已超越夏原吉。按照洪武祖制规定，翰林官最高可升为正五品的殿阁大学士，仁宗无法通过提升官职的形式，使杨士奇地位超越夏原吉。面对祖制的限制，仁宗采取迂回办法，转而倚重虚阶，重新排定五臣地位。蹇义被授予少师之衔，从一品，为当时最高品位<sup>2</sup>。杨士奇在永乐时尚为翰林侍讲，正六品。此时一跃而进少傅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一品<sup>3</sup>，地位仅低于蹇义。夏原吉被授少保，地位低于杨士奇<sup>4</sup>，三人从而位列三公。而杨荣与金幼孜尽管在永乐时地位已在杨士奇之上，此时因为与仁宗关系疏远的缘故，让位于下，分别被授予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正二品；太子少保户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正二品<sup>5</sup>，仅被纳入三孤序列。杨士奇不仅后来居上，成功超越同僚杨、金二人，而且进一步打破阁部品位格局，带动内阁地位得以提升，只不过这种提升源于仁宗与杨士奇的私人关系，而非内阁自身制度的内在驱动。

在蹇义、杨士奇地位的安排上，仁宗延续了旧的制度规则，仍然尊崇吏部作为百官之首的传统地位，命蹇义仍居杨士奇之上。“初设内阁，杨文贞士奇历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师，止兼兵部尚书、华盖殿三官。时蹇忠定义以少师为冢宰，朝廷不欲文贞班居其上，以存冢宰之体也。”<sup>6</sup>在政治运

1、朱鸿：《论明仁宗监国南京之官僚及其笃念旧人之政》，《“国立”编译馆馆刊》1992年第2期。

2、《明史》卷一四九《蹇义传》，页4148。

3、《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页4133。

4、《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页4153。

5、《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页4140；《明史》卷一四七《金幼孜传》，页4127。关于仁宗与杨荣之关系，多数记载认为仁宗嫌远杨荣，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明中期阁臣尹直：《簪斋琐缀录》指出，仁宗对杨荣也颇为感恩，但王世贞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推测。“《琐缀录》言仁宗在位时，一日内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赵府为储，谕意于东杨。东杨即对以赵府面鼻欹侧，不宜正位。遂宣赵府熟视，顷之意顿罢。仁庙闻之，即日降内批，东杨加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西杨得旨怀进，请加‘太子’二字于少傅两傍，乃传出。未几，复升工部尚书。夫立赵之意素所未闻，岂内臣假以为东杨地乎？按成祖颇不乐于东宫，初以诸将推属汉邸，用擅募勇士、杀兵马指挥而解。后甚属意赵邸，以孟指挥谋拥立而解。东杨之阻赵邸未可知。然在西杨进少保后，东杨以太常卿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少傅，金文靖以户部右侍郎武英殿学加太子少保，俱同日。未几，东杨进工部尚书，金亦进户部。然则初未有加少傅与西杨阻之之说可推也。东杨后赐玺书奖谕，令三俸兼支，则赏其榆木川顾托之功，或兼以阴拥翼故，不可知。”（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本，页982，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

6、（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〇《内阁》，页10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作中，蹇义地位也高于杨士奇。“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议，预者三、四人，而公居首。”<sup>1</sup>

仁宗不仅在品位制定上提升蹇、杨二人，在实际决策中也最倚重此二人。如下例<sup>2</sup>：

（洪熙元年四月）壬寅，有至自南者，上问所过民安否。对曰：“淮徐、山东饥，有司急夏税。”召问少师蹇义，对如之。遂召杨士奇等，令草诏免之，并秋粮、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曰：“请使户、工二部臣与闻之。”上曰：“有司虑国用，必持议不决，救民之穷，不可迟疑。”时上坐西角门，命士奇等就西角楼起草。……上曰：“善！”立书诏用玺。顾士奇曰：“今可语二部矣。”

正是由于仁宗最信任者为蹇、杨二人，鉴于其他三人亦为中枢集团中成员，在朝堂议政中难以直接排斥，遂通过单独赋予二人银章密奏之权，构建另外的交流渠道，使部分事务的解决由三人私下决断。这是仁宗开创银章密奏之例的最初目的。但具有密奏权人员的增多使仁宗的初衷并未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杨荣、金幼孜在永乐年间皆曾充东宫官，皆充右谕德，金幼孜负责讲《春秋》。这也是二人虽处北巡集团，不过仍然与监国集团保持正常关系，并帮助仁宗登基的原因之一。既然如此，为何仁宗还要对自己的“师傅”持冷漠态度呢？这主要在于仁宗为太子时，年纪已经甚长，较少受到东宫讲读官员的影响，与在政治上直接协助自己的监国官员关系最为密切与直接。仁宗即位后，亦感念东宫旧谊，史称：“仁庙待官僚厚，如邹济、徐好古、王汝玉卒，皆赠官保，赐谥，予春秋祭。”<sup>3</sup>不过在政治上，仁宗并未给予这些官员如监国旧臣那样的重视与优待。在赐予杨荣、金幼孜银章的谕旨中，首先强调二人是“先帝旧臣”，其次才指出二人也是“东宫旧臣”，这与仁宗对蹇义、杨士奇的定位差别很大。

仁宗去世之前，再赐蹇义、杨士奇银章，只不过这种银章不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只是仁宗表彰二人，显示恩宠的荣誉图章而已。后世银章之赐不仅包括具有密奏标识功能的图章，也包括这种褒奖性图章，皆延续了洪熙旧制。

上自侍太祖皇帝，明于星象。臣士奇侍监国时，间以教臣曰：“宋、元儒者多晓习，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书蹇义、夏原吉、杨荣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门，毕。上问：“夜来星变，曾见否？”皆对曰：“未见。”上曰：“蹇三人虽见不能知，士奇当知之。”臣对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叹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罢，召蹇义、臣士奇至奉天门，谕曰：“监国二十年，为谗匿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赖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义、

1 《东里文集》卷一九《故少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定蹇公墓志铭》，页279。

2 （清）谈迁：《国榷》卷一八《仁宗洪熙元年》，页1251，中华书局，1958年。

3 《国史唯疑》卷二《洪熙》，页49。

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已脱险即夷，皆先帝之赐，陛下之诚之效，更不烦圣明多虑。”上曰“即吾去世。后谁复知吾三人同心一诚。”遂出二敕二印，赐两人。臣士奇得‘杨贞一印’，敕曰云云。皆拜受而退。盖逾月官车宴驾矣。呜呼！痛哉。<sup>〔1〕</sup>

## 四 结 论

明代皇帝赐予阁部大臣银章，以其封识揭帖，密奏政事的现象最早见于洪熙朝。仁宗之所以有此举措，是为专意委任监国旧臣吏部尚书蹇义、阁臣杨士奇而设之单独渠道。但由于杨士奇之力请，所有内阁成员皆获此权。出于平衡的考虑，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获银章密奏之权。仁宗之所以开创银章密奏之例，与其感念永乐年间监国旧臣之情谊，倚重蹇义、杨士奇的政治意识有关。永乐年间，由于朱棣经常北征与巡幸的缘故，中枢政治集团一分为三，形成北巡、监国、留守三大政治集团。前两个集团的关系较为紧张。仁宗即位后，便以永乐朝中枢政治集团的分野为界限，以人事关系重新构建中枢政治格局，将监国旧臣置于中枢政治的核心层面，其次是留守旧臣夏原吉，最外层的是北巡旧臣杨荣、金幼孜。但由于银章密奏被普遍地赋予了中枢集团的五大臣，仁宗做法的初衷反而被掩盖了。银章密奏对洪熙政治并未产生仁宗所预期的作用，这与密奏在传统观念中的负面印象有关。相应，对密奏在明代中枢决策中之作用，不应做过高的估计。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年。故宫博物院赵中男教授鼓励笔者发表，并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致以谢意。文中错误由本人负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赵中男)

---

〔1〕 《东里文集·东里别集·圣谕录》卷中，页403—404。

---

## The Silver Signet and Secre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 Hongxi's Central Politics

Zhao Xianhai

**ABSTRACT:** It was in Hongxi's (洪熙) reign that the Ming emperor who intended to make a special access for his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Jian Yi and Yang Shiqi once in charge of the civil affairs favored them with silver signets to seal or identify the notices, or to present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But with Yang's earnest reques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Nei Ge) were entitled to the silver seals each later. Further more, out of the equal treatment without discrimination, Emperor Hongxi (洪熙) also granted a silver seal to Xia Yuanji, minister of the board of revenue. However, his strategy didn't work well as he expected as a result of the traditional negative understanding of 'secre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Therefore it is viewed that the 'secre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can not be overestimated in making significant decis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it mirrors Hongxi's (洪熙) emotional thought of the governing strategy that Emperor Yongle (永乐) used to take to reconstruct a central politics with human relations as the guideline.

**KEY WORDS:** silver signet and secret memorial; Hongxi; central politics

*The articles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60 to 069.*

---

## On the Princess Consort of the Ming Dynasty

Liu Shaohua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princess consorts (Fu Ma) were mostly selected among the sons of the princes, the marquises or of those who had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until Xuande's (宣德) reign when they gradually came from the ordinary families. Meanwhile, their wedding ceremonies changed a lot. There used to be three ways for the princess consorts to be educated such as: to arrange for the sub-registers of the academy to take lectures to them, they learned at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Learning (Guo Zi Jian) or to assign the secretaries of the office of etiquette and regulations to take care of their education, but all of which ended with the unfavorable effects. On Ming's system grounds, the princess consorts were appointed the official status of 1 B (rank 1, lower class) with the salary of 1,000 *dan* in general but varied individually. They were in command of the troops to defend the frontiers or to take charge of the military affairs, or they worked at the temporary business like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managing the imperial clan court or commanding the imperial guardsme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princess consorts were relatively high-rank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ut declined later without real power, they were humbled even by the eunuchs and maids on some occasions.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the princess consorts; education; official rank

*The articles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70 to 088.*